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现实 地位变迁:理论与实证

郑炎成¹, 陈文科²

(1.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2.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1)

摘要:明确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研究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基础性课题。已有的研究文献未能区分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和现实地位,且多以县域经济自身的重要性论证县域经济的地位,不尽合乎研究规范,因而说服力不强。文章按规范要求采用比较分析范式研究了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现实地位及其变迁,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从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给定了县域经济相对于其他行政性区域经济体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现实地位,且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降低了我国县域经济的现实地位。1988年至2002年的实证观察证实了文章的这一基本判断。这将为全面讨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县域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现实地位;理论与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6)03-0005-16

一、关于我国县域经济地位的文献评论及本文的研究重点

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县域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经验表明: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否得到重视,直接关系到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绩效及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因此,研究县域经济地位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即提高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中的地位,为县域经济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从而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研究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是要指明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应该占有的地位,即县域经济作为一级行政性区域经济体在国民经济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二是要探明县域经济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即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县域经济实际被赋予的角色。前者可称之为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它由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内生决定,

收稿日期:2005-12-08

作者简介:郑炎成(1961—),男,湖北英山县人,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陈文科(1945—),男,湖北鄂州市人,湖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反映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后者为县域经济的现实地位，它由国家一定时期内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体制外生给定，它决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条件和绩效。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只有当县域经济的现实地位和理论地位取得一致，县域经济的地位才可谓定位适当，适得其位，县域经济才能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实现帕累托最优协整。

已有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研究了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试图从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及其重要性来证明县域经济具有重要地位。陈文科(1987)从多方面论证了“县经济”^①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1)县经济的主要产业是农业，而农业又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因而县经济在我国经济中也居基础性地位；(2)县经济拥有巨大的资源总量和市场容量，因而县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享有足以影响国民经济总量大小的规模性地位；(3)县经济内含的工业充满创新和发展的活力，具有补充国家大工业的潜力，因而县经济也是我国工业化的生力军；(4)县经济体制是国家宏观经济体制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是国家宏观经济体制的中观层次，县经济体制改革是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和部位。任新木(1986)、刘书楷、赵世荣(1988)、孙义文、王长远、张成礼、范景文(1990)都持有相似的观点。何康(1991)也从县域经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特征、县域经济的总量规模、市场容量、资源储量和人口涵养量及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等角度提出了“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区域基础和基本支柱”的观点；王盛章、赵桂溟(2002)认为“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国家经济和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剑波(2002)更是从县域经济的影响和县域经济几乎包含了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所有主要问题以及县域经济的综合性等方面把县域经济提高到了“共和国的基石”的高度。这些已有研究文献大都确信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厉以宁(1999)曾从缩小地区差距的角度提出应重视县域经济的思想，可惜他并未作深入讨论。上述文献对正确认识我国县域经济大有裨益，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国家对县域经济的政策决定。^②

然而，细究已有研究成果，仍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明显欠缺。首先，县域经济地位具有明确的概念规定性。根据“地位”一词的语义，县域经济地位是指县域经济作为一行政性区域经济体相对于其他行政性区域经济体在国民经济中所在的位置。在我国现有政体下，与县域经济同属于以行政区域生成的行政性区域经济体的，横向来看还有非县域经济(依地级以上城市而生成的行政性区域经济体)，纵向来看则还有省域经济、地(市)域经济(由地区级行政区划而产生)和乡镇经济。已有研究文献从其引用的论据来看，似乎只讨论了相对于横向的非县域经济而言的县域经济应占有的地位，而没有讨论相对于纵向的省域经济、地域经济和乡镇经济，县域经济占有怎样的地位。在纵向省域

经济、地域经济、县域经济和乡镇经济存在明显的上下级包含与被包含关系的背景下,已有研究文献不能很好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强调县域经济的地位?尤其是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县域经济的地位?这一问题不能从理论上回答清楚,就不能真正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对县域经济的考虑,重视县域经济的做法就极有可能被重视地域经济、重视省域经济所完全替代。其次,已有的研究文献大多侧重研究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而很少讨论县域经济的现实地位,它们大多未能注意到: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县域经济只是我国多级行政性区域体中较低的一级,其理论地位可由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内生决定;而在实践中,县域经济的真实地位又往往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外生给定的。因此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与现实地位可能并不一致。外生决定的县域经济现实地位反映了县域经济的真正发展条件,决定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绩效。不讨论清楚县域经济的现实地位就无法真正评价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是否真正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无法判断县域经济发展绩效是否达到其发展潜力的临界值。

关于县域经济相对于横向的非县域经济和纵向的省域经济、地域经济和乡镇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理论地位,作者在《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地区差距的解释力分析》一文中略涉其意,指出:发展县域经济是缩小我国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关键。然而,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本文的研究重点仅在于讨论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现实地位的决定和演变,以廓清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对县域经济的重视程度。文章第二部分集中分析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对县域经济现实地位的决定;第三部分则从理论上描述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对我国县域经济地位的给定;第四部分通过建立模型,提取主要变量对 1988 年以来我国县域经济现实地位的变迁进行量化分析;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及提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现实地位的决定机理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国中央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蓝图及其相关方针政策和制度安排的选择,是一国所有经济活动的最关键性约束之一。县域经济作为行政性区域经济(体)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设计。

(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现实地位的垂直决定

中央政府在进行国民经济空间布局时,通常要考虑一个重大问题,即以多大的空间范围作为基本空间单元进行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组织,才最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确定的经济目标。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假定一国资源赋禀有限,中央政府在多大的区域范围内动员并配置资源,以形成有生产力的经济活动,并保证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一般理论认为,经济运行会自

动按比较优势原则形成有分工的经济区域,中央政府只须按照经济的区域分工来设计国民经济的空间布局。但当一国经济尚不存在有效的经济区域分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一个可能选择是按照行政性区域来分配资源和组织经济活动,由此产生了行政性区域经济体。在这样的国家里,上述问题就转化为:中央政府在不同级别的行政性区域中应该选择哪一级行政性区域作为国民经济布局的基本空间单元呢?以中国为例,中国现行五级行政性区域,即国家级行政区域、省级行政区域、地级行政区域、县级行政区域和乡镇行政区域,中央政府应该选择其中的哪一级行政区域作为基本的空间单元来布局中国的经济和部署中国的发展呢?

中央政府在选择行政性区域作为国民经济布局的基本空间单元时,一般会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规模,即在可选行政区域内应该能够集中形成有效的资源规模,以保证实现经济活动的目标;(2)管理权威,即所选行政区域内应该有对经济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运行进行有效调控的手段和代理(或执行)能力;(3)操作方便,即所选区域的大小必须有利于减少区内和区域间的协调成本和经济运行损耗;(4)福利边际,即当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后,经济成果和利益可能到达的地域边界和人群边际。一旦选定某一级行政区域(以下称之为“目标层级行政区域”)作为基本空间单元进行国民经济布局,中央政府就会采取各种措施强化目标层级行政区域作为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组织的基本空间单元之地位。中央政府强化目标层级行政区域作为国民经济布局基本空间单元的经济政策含义十分明显,即更多地依托目标层级行政区域组织经济活动,并在分配资源和制定经济政策中,优先满足以目标层级行政区域组织的经济活动对资源的需求和对调控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的需求。中央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1)中央政府直接在目标层级行政区域进行投资,通过建设大中型项目拉动目标层级行政区域的资源动员和经济增长。这些项目对目标层级行政区域内的资源配置产生直接影响。

(2)中央政府给目标层级行政区域的辖区政府配置更多的资源,尤其是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办法之一是增加对目标层级行政区域的财政直接转移支付,并将预算直接下达到辖区政府手中;办法之二是与辖区政府进行财政分权,使辖区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手段,获得财政收入和控制财政支出。

(3)中央政府赋予目标层级行政区域的辖区政府更多的经济管理权力和手段,从而使其有能力在辖区范围内动员和重新配置资源,实现对辖区经济的有效干预。中央政府给予的权力和手段主要有:允许辖区政府制定有影响力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并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的战略和计划之中;允许辖区政府对辖区内的经济活动拥有更多的经济审批权,使得区域内的经济活动直接受目标层级行政区域的辖区政府控制;给予辖区政府更充分的经济立法权和经济

执法权,以保证其对目标层级行政区域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威。总之,中央政府通过采取这些举措赋予目标层级行政区域辖区政府以经济上更多的主权,使其有能力集中和支配更多的经济资源,以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组织地方经济的发展。

中央政府为确保目标层级行政区域作为国民经济布局基本空间单元而采取的上述举措,对依行政区域而生成的行政性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不言而喻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流进一定行政区域的经济资源是一定的,当这个定量的经济资源及其支配权在这个行政区域按垂直方向在不同层级行政区域之间进行分配时,如果资源及其支配权更多地聚集于中央政府选择的目标层级行政区域及其辖区政府手中,就必然意味着,其他非目标层级行政区域及其政府会较少拥有资源和支配权,从而在经济发展中有较少的作为。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所导致的资源及其支配权在目标层级行政区域的聚集,实质性地决定了行政性区域经济体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县域经济通常是一国行政性区域经济体中较低位的一级,中央政府是否以县域作为国民经济布局的基本空间单元,直接决定了县域经济可以得到的资源配置和支配权,并最终给定了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

(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地位的水平决定

不仅如此,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也在水平方向上决定了县域经济相对于非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这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源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产业政策的安排。一个国家常常会根据国情的变化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确定本国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应采取的相应政策,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对一些资源不足,尤其是资本匮乏的欠发达国家而言,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以摆脱以农业和其他低级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低级化格局,大多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优先选择。经济学已证明:工业和服务业因为厂商和服务商对规模递增收益、内部市场效应和经济正向外部性的追逐而在地理分布上具有较强的向城市地区聚集的倾向;而城市则因为存在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交易费用(尤指产品运输成本)的节约,具有较强吸引工业和服务业的聚集效应。在没有其他外部力量干预情况下,工业和服务业与城市的这种相趋相吸关系,会使一国和一地区经济资源随着工业和服务业向城市集聚,直到城市出现拥挤效应而使工业和服务业蒙受负向经济外部性造成的经济损失大于聚集带来的经济效益为止。一国政府对工业、服务业和城市的这种相趋相吸是更多地加以利用或加以干预,完全取决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实施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取向。对于那些资源丰富,资本充足且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对那些资本虽然不足,但追求经济平衡发展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如何实现国民经济在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是其经济发展之路的优先目标,其政府就有可能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来干预这种

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县域经济所在的地区并非必定是国家和地区进行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的次优选择,县域经济有可能获得平等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机会,从而影响到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

但对资源不足,资本匮乏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集中有限资源和资本,尽快建立起有效的工业和服务业体系,以加快经济增长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优先目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会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以促使资源工业和服务业向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发展。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县域经济所在的非城市地区就会因为不具备这种产业聚集条件而必定成为国家和各地区进行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的次优选择,县域经济会因资源配置份额不足和产业布局不利而降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

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取向及其规定的产业政策安排对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相对于非县域经济的实际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的综合定位

县域经济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最终地位是由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从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同时确定的。总的来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首先从水平方向决定了县域经济相对于非县域经济的国民经济实际地位,又从垂直方向通过不同层次区域内的辖区政府的作用而弱化了县域经济相对于非县域经济的地位。因为资源集中和产业聚集会在不同层次的行政区域中发生,因此,当资源配置以更高级的行政区域作为“基本空间单元”进行时,资源和产业会向更大的城市集聚。而如果县域不成一国经济资源的“基本空间单元”,则意味着虽然资源也向县域内发生流动,但最终由于县域相对于地域和省域而获得较少的经济资源及其支配权,县域仍难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权和产业份额,县域经济也就不可能获得较重要的国民经济地位。

显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真正定位,最终体现为国家配置给县域经济的经济资源和产业的多少。因此,在现实中,人们可能通过观察县域经济从国家经济资源总量和产业中取得的份额来判断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真实地位。认识到这一点对进行我国县域经济现实地位的分析非常重要。

三、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县域经济现实地位的变迁

(一)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

深入探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评判其功过是非不是本文研究的侧重点。在此作者只打算以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成果作参考,对我国“一五”以来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作粗线条的梳理,以此作为考察我国县域经济现实地位变迁的依据。

Lin等(1996、2002、2004)非常肯定地认为:“一五”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

实施了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正是这一战略导致了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不力和改革开放后仍难以解决发展瓶颈的种种经济困境(如地区差距、大中型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等等);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转而探索性地实施了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才创造了近2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Lin等人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仍成为许多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文献的立论基础。然而,与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实施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同,Lin等仅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后实施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但并没有十分肯定地说明这一战略到底是什么战略,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还没有完成“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并没有偏离一个发展中大国应该有也只能有的追求,工业化始终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不二战略选择。只不过在追求工业化过程中,克服了过去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错误做法,没有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选择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服务业等。改革开放后,曾经为我国经济增长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农业已经因为政策效率和比较优势的穷尽而仅能以满足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存续目标,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农业少不得又多不了”已是是我国农业产业的最大发展空间了。别无其他选择,中国只能走工业化之路。因此,本文认为:如果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定义为一国中央政府关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蓝图及其相应的方针政策加制度安排,那么,工业化自始至终都是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蓝图。只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改革开放前我国主动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揽子方针政策和制度安排,而改革开放后则被动选择了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业区段的方针政策和制度安排。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的定位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国民经济尚处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百业待兴而资源严重不足、国际环境十分不利的形势下,为赶超欧美工业化国家而实施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其目标是集中有限的资源率先建立起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工业,进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此,中央政府采取了针对性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安排。首先,实行高度集中的宏观经济计划体制。一切资源配置均实行中央政府计划调拨制,以保证有限资源顺利配置有关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其次,实行高度统一的微观公有经营体制。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属于国家所有,而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归集体所有,目的在于保证国家对这些企业及其经济活动的控制以及国家计划的落实;第三,采取人为扭曲的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政策。几乎所有的经济产品和生产投入要素均由中央政府制定价格,这些价格严重偏离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目的在于保证资本积累并优先满足重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实质性地对(1)在多大区域范围内动员、集中和调配资源;(2)由哪一级区域

政府调控配置集中起来的资源;(3)集中起来的资源配置给什么产业和区域等问题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即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动员、集中和调配所有资源并安排产业项目和地区布局。这就意味着,在当时我国实行三级行政体制下的省和县(市)只不过是中央计划的执行单位,省域和县(市)域也不过是中央计划的执行域,省域经济或县(市)域经济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体。

那么,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实际扮演何种角色呢?

(1)体制定位。县域经济的管理者是中央计划的基层执行者。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下,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均由中央政府制定,一切资源均由中央政府计划调拨,而一切生产活动则均按中央计划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三级行政制中的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作为辖区经济的管理者实际上只负责执行中央计划,按中央计划组织辖区内的经济活动。县级政府是三级政府中的基层政府,其经济职能只是保证中央计划在县域内的落实。县域经济的发展直接由上级政府作出决策,然后交由县级政府执行和组织落实。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甚至不能做到以配置到本县的资源要素,按本县经济的实际组织适合本县的经济活动,因为资源的运用必须符合中央的规定。惟一的例外大概是县级政府有权调动县域内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以完成国家需要的农业劳动集约,“学大寨”所形成的一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概是这一例外的真实成果。

(2)产业定位。县域经济仅以“五小工业”作为国家大工业的补充。既然国家的发展蓝图是实现工业化,那么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县域经济是怎样参与国家工业化的呢?这一问题涉及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的产业定位。为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中央计划对县域经济的产业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一,农业是县域经济的主要产业。大力发展农业,为国家提供廉价的商品粮是国家对县域经济的主要要求;其二,允许县域经济发展“五小工业”作为国家大工业的补充,且这些工业项目均处在国家计划的监管之中;其三,在县域经济还存在一定量的公有性质的流通服务业,这些流通服务业更多地是作为国家物资流通的渠道而存在,主要起着为国家收购输送物资的作用。县域经济以经济剩余为国家主体工业建设作贡献,但实际并不能参与到国家工业化的主体之中,也无法从中获得经济增量和存量方面的好处。

(3)资源定位。县域经济活动的要素配置受到上级预算刚性约束。县域经济虽然是三级行政体制下生成的最低层行政性区域经济体,但其经济活动仍被全面纳于国民经济计划之中。县域经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和何时生产等基本问题均由国家计划确定,经济活动所需的资源也由国家统一预算划拨,生产的产品也由国家统一收购和分配。县域经济并没有争取更多

经济资源的必要和可能,但同时国家也会有计划地调拨一些资源给县域经济。然而由于县域经济活动处于国家经济计划的末端,在资源由上至下集中统一配置的情况下,往往下达到县域经济中的各种计划指标是最为刚性的,因为国家有限的资源必须首先满足国家大工业的需要,县域经济的产业并非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产业重点,因此,划拨到县域经济的资源常常要视国家资源的丰欠程度而定。我国建国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县域经济只能获得最严格控制下的资源供给。

由上分析可知,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中,县域经济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县域经济控制资源少,产业分布少,县域经济自调节能力也受到严格限制,与当时同属于地方行政性区域经济体的省域经济相比,县域经济缺乏对国家经济主体部分的参与和分享。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和重大产业均分布于基础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和新兴工业城市地区。

(三)比较优势产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县域经济现实地位的调整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战略,转而实现比较优势产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转变,使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不断对产业或产业区段进行重新选择以及对产业布局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由于比较优势及其赖以形成的资源禀赋结构会随经济发展而动态地升级,预计我国经济的重新选择和调整过程不会很短。为实施战略转变,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改变。其中对县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变化有:(1)资源配置变计划调节为主为市场调节为主,鼓励资源流动;(2)改革国有企业体制,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方针政策;(3)变“三级行政体制”为“五级行政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五级财政下的分税制”; (4)实行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鼓励资金的优化组合;(5)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对国际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6)全党抓经济,执政党以政治挂帅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地方党委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更大的责任。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及制度的调整对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进行了重新定位。

——县域经济在国家行政性区域经济体中层级序位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第三层级下降到第四层级,而且在县域经济内部还受到乡镇经济细分。县域经济在国家行政性区域经济体中的这一层级序位变化不仅大大削弱了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而且大大降低了县域经济内部统筹发展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前,县域经济虽然是国家三级行政性区域经济集中的最低一级,但县域经济终究在国民经济计划之列,县域经济非常确定地列于中央计划之中,且在当时实行的中央统一财政体制下,县域经济并不担心财政分权制度下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的竞争和博弈。改革开放后,政府层级

的增加,财政分权制的实行以及全党抓经济的具体实践,使县域经济不仅远离了中央计划,而且还面临不同层级辖区政府的竞争和博弈。这使得在资源和产业蛋糕的划分中,县域经济面临份额下降的可能性,而且在县域经济内难以做到统筹安排,优化组合,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资源和规模产业甚至市场。现实情况是:县域经济不仅要受到国家的制约,而且还要接受省、市的约束和在县域经济内部乡镇各自为战、资源分散的困扰,常常与县域经济应该有的合理目标相左。由于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县域经济获得的资源尤其是资金均须经过上级政府之手,县与省、市处在不平等竞争和博弈之中。

——县域经济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正受到获取工业发展资源方面的挑战。改革开放前,县域经济的“五小工业”是在国家经济计划的保障下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只要立项建设,就可以获得资源供应保障。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渐给县域经济中的“五小工业”断奶,尤其是国家为保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实施“抓大放小”的政策,通过财政政策和银行商业化,有选择性地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流向,尤其是资金的流向,使得大多数县域经济中的工业企业受到更严峻的资源约束。近年来,除少数发展较早且已形成自我积累能力的地区以外,大多数县域经济中的工业企业普遍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原因之一正在于此。

——县域经济在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聚集中正在失去竞争优势。改革开放前,县域经济虽然不是国家工业化重点部位,但资源的计划配置和产业的计划安排使得县域经济仍获得了一定的生产要素投入和非农产业项目建设。改革开放后,国家虽然给予了县域经济相对平等的市场竞争机会,使县域经济中的农业和乡镇企业一度获得了长足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微观投资体制放活,银行商业化经营和鼓励外向型经济为取向的经济政策调整,激活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产业的集聚倾向,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投资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带动资源要素和产业项目向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正向外部经济和市场多样化的先发地区和城市聚集,在这些地区和城市尚未有出现拥挤效应和负向外部经济之前,有限的资源就会随产业聚集不断向这些地区流动,而不会向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基础条件较落后的县域经济所在地区扩散。近年来,从县域经济中流走的大量资金、人才和企业家表明了县域经济在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聚集方面的不利局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我国围绕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国家工业化战略采取的一系列市场经济取向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虽然从理论上看给县域经济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会,理应有利于增强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初始状态不同和路径依赖惯性,县域经济在资源配置、产业集聚等方面的地位明增实降,大多数县域经济处于资源要素出大于入、产业和资本撤大于立的空壳化状态。县域经济相对于纵向的省、市区域经

济体和横向的非县域经济体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四、改革开放后我国县域经济实际地位下降的实证分析

以上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实际地位的变迁。这一理论分析应该得到证实才具有说服力。为此,本文第四部分拟对 1988 年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实际地位的变化作一实证观察。应该声明一点,本文之所以选择 1988 年至今作为分析时段,一是出于资料的可用性方面的考虑,二是考虑到我国市场化取向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实际起步于 1990 年代,此前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并不清晰。

(一)思路和方法

由上分析可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致从三个方面给定了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即给定了县域经济辖区内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给定了县域经济的可能集聚的经济资源要素份额;给定了县域经济所能形成的产业生产能力。其中,由于县域经济辖区内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最终仍需作用于资源要素配置和产业组织,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给予县域经济辖区内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大小仍然会而且必然会从县域经济获得经济资源要素的多少和县域经济的产业生产能力大小中加以反映。因此,本文认为:为了分析某一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有什么影响,只须观察:(1)同国民经济中其他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配置到县域经济中的经济资源要素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2)同国民经济其他行政性区域经济体相比,配置到县域经济中的产业生产能力是增长得更快了还是增长得更慢一些?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文拟选择 1988~2002 年作为观察期,采用比较分析法作如下具体的分析:

首先,进行垂直比较分析,即对省域经济,地(市)域经济和县域经济在 1988 年以来每一时期获得的经济资源要素增量和新增产业生产能力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测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从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布两方面对不同行政性区域经济体的定位。然后,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即对同一观察期县域经济和非县域经济在进行相同比较分析,以进一步揭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实际地位的影响。

(二)变量、数据和模型

1. 变量设置。站在县域经济角度作上述比较分析,面临选择恰当的分析基础变量的困难。无论是县域经济或非县域经济,无论是地(市)域经济还是省域经济,其聚敛的经济资源要素包罗万象,既有固定在区域自然环境中的土地、矿产等不可流动性天赋资源要素,又有获得性的资金、劳动力、企业及企业

家等可流动性后天资源要素；既有从区域外流入的资源要素，又有从区域内流失的资源要素；既有国家或上级区域经济直接配置到位的分配性资源要素，又有随经济活动主体争取到的竞争性资源要素。同样，县域经济等行政性区域经济体内置的产业亦千差万别，颇具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口径、分类齐全的相关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

本文不得不以从 1988 年中国经济的现实中寻找有重要代表性的相近指标作为上述比较分析的基础变量。改革开放后，我国区域经济体之间已在资源要素配置方面和产业发展方面逐步形成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主导下的竞争关系。任何经济体要获得更多稀缺资源要素配置，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总要求，使配置到位的资源要素都得到充分调动和利用。否则，流动性资源要素会得而复失（流走），固定性资源要素会闲置弃用。长期地看，县域经济等行政性区域经济体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充分动员并利用所得经济资源要素实际上就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投资过程和产业形成过程。由此，本文认为：一个区域经济体内一定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流动资产占用总额大抵可被用来反映一定时期内该经济体动员并利用的经济资源要素规模，而相应期间该经济体的产业生产能力（在充分利用资源条件下）完全可由该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体现。考虑到固定资产规模和开工程度对流动资产占用额的决定作用，以及流动资产的价值通过一次转移至经济体总产出之中被计入 GDP，本文决定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 GDP 两大指标作为分析我国县域经济等行政性区域经济体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安排中获得经济资源要素配置和产业生产能力配备状况的基础性指标变量。

2. 数据采集。本文选择 1998 至 2002 年省市和各地级以上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 GDP，按照省域经济—地级以上城市市区经济—县域经济的分离办法，得出县域经济的相应指标值，并分别计算出各年份省域经济、地（市）域经济、县域经济及非县域经济（即地级以上城市市区经济）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 GDP 及其变化速度，以形成本文分析的基本数据^③。

3. 模型设计。（1）垂直比较分析模型。在观察了所采集数据的散点图后发现，在 1988 年至 2002 年期间，按县域经济、地（市）域经济和省域经济分别计算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PFKI）和人均 Δ GDP（ Δ PGDP），均大致呈直线增长趋势。这一特征，使得本文可以利用较为简单的时间趋势数据模型，来观察 PFKI 和 Δ PGDP 对应于不同层级行政性区域经济体的变化趋势。

$$PFKI(2002)_i = a_i + b_i T \quad (1)$$

$$\Delta PGDP(2002)_i = a_i + b_i T \quad (2)$$

式（1）和式（2）中， $i=1,2,3$ ，分别代表省域经济、地（市）域经济和县域经济。 a 和 b 分别为模型的常数项和斜率， a 相当于 PFKI 和 Δ PGDP 在 1988 年至 2002 年的市场起点值， b 则相当于 PFKI 和 Δ PGDP 随时间 T 变化而增长的速率。利

用 1988~2002 年的数据,推算出相应的 a 值和 b 值,则可以比较出县域经济、地(市)域经济和省域经济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给定框架在 1988 年获得的 PFKI 和 Δ PGDP 的起始状态和至 2002 年所发生变化的趋势特征。

(2) 水平比较分析模型。当一国经济被水平划分为县域经济和非县域经济时,其经济资源要素和产业不外乎在此二者之间配置。非县域经济得到较多的资源要素和产业,就意味着县域经济拥有较少的资源份额和产业份额。

这里本文提出一个待检验的假设,即 1988 年以后,国家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中给予县域经济比以前多一些的重视,从而使得县域经济在经济资源要素和产业生产能力配给方面无限接近于非县域经济,即出现了所谓的收敛性 (convergence)。在本文中,即县域经济和非县域经济所获得的 PFKI 增长速度和 PGDP 增长速度越来越趋于一致。对此假设,我们借用 Barro 和 Sala-I-Martin 分析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 β -收敛性的简化模型加以验证,因此有:

$$[1/(T-t)]\log(k_{iT}/k_{it}) = A - [(1 - e^{-\beta(T-t)})/(T-t)]\log k_{it} + \epsilon_{it} \quad (3)$$

$$[1/(T-t)]\log(y_{iT}/y_{it}) = A - [(1 - e^{-\beta(T-t)})/(T-t)]\log y_{it} + \epsilon_{it} \quad (4)$$

(3)式和(4)式中, A 为常数, ϵ_{it} 为误差项, t 和 T 为观察期初和期末时点, $T-t$ 为观察期长度, $i=1, 2$, 表示县域经济和非县域经济; k_{iT} 和 k_{it} 分别为期末和期初 PFKI, y_{iT} 和 y_{it} 分别为期初和期末 PGDP, β 为收敛速度系数。 $\beta > 0$ 表示县域经济和非县域经济的相应指标增长出现收敛,差距缩小, β 值越大, 收敛越快; $\beta < 0$, 则出现发散, 表明县域经济和非县域经济相应指标的差距扩大, β 越小, 差距越大。

(三) 结果与讨论

1. 垂直比较结果与讨论。利用 1988~2002 年的数据,对(1)式计算的结果见表 1 所示。

表 1 三级行政性区域经济 PFKI 的变化趋势

经济体	i 值	a 值	b 值	检验结果
省城	1	1 552	216.8	
地(市)城	2	1 336.9	174.9	置信度大于 95%
县域	3	938.07	117.5	

从表 1 可知,1988 年时,省域经济、地(市)域经济和县域经济有不同的 PFKI 起点值, $a_1 > a_2 > a_3$, 说明当时在配置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国家延续了对省域经济的倾向性和对县域经济的不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2002 年国家仍然把更多的以固定资产为代表的经济资源要素配置到省域经济,县域经济所得仍为最少,且此差异越来越大,表现为 $b_1 > b_2 > b_3$ 。

结果是,(2)式的回归结果与(1)式一致,县域经济的 PGDP 随时间推移而与省域经济、地(市)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见表 2)。这表明,县域经济内的产业发展明显慢于省域经济和地(市)域经济。

表 2 省、地、县三级行政性区域经济体 $\Delta PGDP$ 的变化趋势

经济体	i 值	a 值	b 值	检验结果
省城	1	531.4	42.9	
地(市)城	2	435	30.3	置信度大于 95%
县域	3	275,901	8.2	

2. 水平比较结果与说明。利用模型(3)和模型(4)计算的结果显示,1988 年至 2002 年期间,我国县域经济和非县域经济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 GDP 两个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差距扩散趋势。 β 值分别为 -0.028 和 -0.031, 即县域经济和非县域经济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PFKI) 方面的差距每年以约 2.8% 的速度扩大,而在人均 GDP(PGDP) 方面则每年以约 3.1% 的速度扩大。这表明,新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给县域经济以更多的重视,反而是更加忽视。

3. 计量分析小结。以上从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进行的计量分析证实,1988 年至 2002 年期间,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的重视越来越少,使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不断下降。其显性依据就是县域经济获得的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性指标的经济资源要素配置份额持续下降和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性指标的产业生产能力相对萎缩。当然,这样的结论是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特例反而证明:只要重视县域经济,其一定可以为地区发展乃至全国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五、观点总结与待研究的问题

围绕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本文得出如下观点:

——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县域经济的重要性来证明县域经济本身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尽合乎理论规范,应该在同其他行政性区域经济体的比较中寻找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理论地位和实际地位。

——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是由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给定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分别从水平和垂直两个方面决定了县域经济相对于其他行政性区域经济体在国民经济中的真实地位所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由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战略转变为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转变也相应地引起了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变迁。

——上述战略转变尽管在理论上可能给予了县域经济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尤其是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大安排使我国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真实地位有所下降,县域经济更加不受重视。

限于篇幅和逻辑安排,对我国县域经济的地位还存在很多值得研究的延

展问题,它们是:

(1)当前县域经济在地位上并未受到重视。但是,在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县域经济是否就应当居于现在的地位?县域经济能否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需要我们将县域经济的地位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层面作更加深入的思考。

(2)县域经济现有的地位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绩效有什么影响?进一步地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和所有国民尤其是县域内国民的福利得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关乎增长与发展、效率与公平、以国为本与以民为本的大问题,深入讨论之,会对建立我国的“和谐社会”十分有益。

(3)应该怎样提高县域经济的地位?这显然将涉及到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的调整。这同样需要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通过,其中正式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参见: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年;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年7月;Brakman, S. , Garretsen, H. ,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ical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89.

③全部基础数据均来自1988~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应栏目。

参考文献:

- [1]王盛章,赵桂溟.中国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2002.
- [2]厉以宁.区域发展新思路[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 [3]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题组.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报告[J].经济研究参考资料,2005(24):27~40.
- [4]伍新木.县经济研究初步[R].1986.
- [5]刘文哲,哈明辉.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态势[J].经济研究参考资料,2005,(27):12~17.
- [6]刘集贤.县域经济: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点[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47~48.
- [7]孙义文.中国县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1990.
- [8]许宝健.县域经济:本质、关键和措施[J].农业经济问题,2005,(4):73~74.
- [9]何振国.县域经济开发新思维[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
- [10]何康.关于县域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1991,(1):7~13.
- [11]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
- [12]陈剑波.非农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M].经济日报,2002-10-22.
- [13]林毅夫,刘明兴.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J].经济研究,2004,(7):48~58.
- [14]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上海经济研究,2003,(3):19~25.

- [15]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订版, 1999.
- [16] 郑炎成、鲁德银. 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地区差距的解释力分析 [J]. 财经研究, 2004, (7): 121~129.
- [17]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县经济改革与发展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1987.
- [18] 蔡昉, 王德义. 比较优势差异、变化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5): 41~54.
- [19] 潘士远, 史晋川.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个文献综述 [J]. 经济学 (季刊), 2002, (7): 753~781.
- [20] Barro, R,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 [M]. Boston: McGraw-Hill, 1995.
- [21] Brakman, S, Garretsen, H. An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ical economic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89.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Status of Inter-County Economy i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ZHENG Yan-cheng¹, CHEN Wen-ke²

(1.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1, China)

Abstract: To find out the status of inter-county economy i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serves as a fundamental research for the study of the former. The existed papers did not distinguish the theoretical role played by inter-county economy from its realistic one, moreover most of them prove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elf which is methodologically insufficient and unpersuasive.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in a comparison analysis pattern to study on the realistic position and its transition of the inter-county economy and argues that the realistic position hold by it, differing from that of other administrative regions, depends o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both historical and current reasons. Furthermore, since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djusted economic strategy has given less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ter-county economy which is confirmed by ou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is will serve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n all-round study of this issue.

Abstract: county economy; nation's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listic posi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责任编辑 许柏)